

#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隋福民 孙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半期, 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激烈论战。著名学者陈翰笙组织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 从当时中国最急迫的农村问题切入, 在无锡、保定开展深入系统的农村经济调查, 搜集了大量的实际证据, 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和经济结构, 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扎实的论证。调查研究结果显示, 近代中国农村, 地权分散、捐税负担较重, 农民受到地租、高利贷等的多重剥削, 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 由此证明了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成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提供了现实支撑, 客观上促进了革命理论和思想的传播。

**关键词:**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陈翰笙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1249 (2024) 01-0130-16

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实践调查, 认为实践调查对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非常重要。实践调查是我们党优秀的历史传统, 是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坚持的工作方法。早在20世纪20—30年代, 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深切了解实践调查的重要性, 并通过实践调查深化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 理清了思路, 解决了分歧, 为中国革命理论的建构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回顾那段历史, 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革命, 理解实践调查对于理论发展的重要性。

## 一、时代的理论问卷: 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

近代以来, 中国长期处于历史转型过程中。欧洲工业革命后, 亚欧大陆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中国没有跟上工业革命的步伐, 逐渐落后; 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在逻辑驱使下, 西方列强要在东方寻找产品市场、建立殖民地, 构建“中心—边缘”国际经济结构。中国以自强、求富为目的开展的洋务运动, 由于甲午战争的失

**作者简介:** 隋福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孙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历史与学术脉络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社会经济调查项目“第五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败而宣告破产，国家日益羸弱。在这种局面下，推翻清政府成为制度变革的唯一选择。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封建帝制，但中国却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前途有了全新的理论指导和发展方向。

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进行思考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就不会有团结人的力量，没有一个符合实践要求的理论就不会有“落地有声”的工作思路，没有正确的理论，革命也不会成功。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当时的两种重要政治力量，都必须首先思考中国社会性质这一重大问题。

孙中山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类似于土耳其。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曾经强盛过，但因其重要的地缘位置，土耳其受到帝国主义的觊觎和侵略。中国有着数量巨大的人口和悠久的历史，也受到列强觊觎。印度半岛和印度洋作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正式文件中对中国的半殖民地的现实作出论述。党的二大决议案指出：“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sup>①</sup>“经济落后如中国，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武人势力的宰割场和糜烂区域。”<sup>②</sup>列宁很早就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他在1915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中第一次提及“半殖民地”这一概念，并把土耳其、中国和波斯列为半殖民地国家，还将这一概念与殖民地区别开来。<sup>③</sup>列宁把中国、波斯和土耳其列为半殖民地国家，指出波斯已经差不多完全变成了殖民地，中国和土耳其正在变成殖民地。<sup>④</sup>不仅如此，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明确指出，半殖民地就是一种中间形式，一种过渡形式，一种并没有完全丧失政治独立的半独立国。<sup>⑤</sup>列宁的看法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需要一个理论的解释。中国是封建社会吗？抑或已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每个社会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和要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如果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那么就说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如果认为中国还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则反之。只有完成民主革命，才能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因此，必须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封建和资本主义因素进行分析，才能判断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当时，从理论高度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行完整的判断非常不易，认识论上的偏差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初期，理论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并不清晰。自古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及其所呈现的特征有别于西方，对于“封建”这

①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4页。

②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2卷，第24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6页。

④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3页。

⑤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94—395页。

一概念也存在争论。

随着国共共同敌人——封建军阀的覆灭，国民党在全国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这时，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为了检阅革命失败的原因，规定革命的政纲，不得不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各党各派为了宣传自己的政纲，打击敌党敌派的政纲，也不得不争论中国社会的性质”，<sup>①</sup>于是，就有了厘清认识的必要。这一厘清认识的过程，史称“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 二、理论不辩不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带来的认识递进

1928年，《双十月刊》最早开始讨论中国社会性质，即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目的是重新确立我们的历史与社会观。同年创刊的《新生命》延续了这一话题。当时《新生命》的主笔是陶希圣，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论述封建制度早已瓦解，地主阶级（通过士大夫）虽仍是中国社会的支配势力，但商业资本主义向来发达，“周的末期，……商业资本主义已发达起来”，<sup>②</sup>“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商业，有官僚，已足够证明当时封建制度的崩坏了”。<sup>③</sup>中国农业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虽然有封建剥削的存在，不能因此就断定中国的社会形式是封建制度，<sup>④</sup>由于商业资本主义的一向发达，“商人资本却成了中国经济的重心”。<sup>⑤</sup>统治阶级不再是封建地主，而是“士大夫阶级”。在中国，“士大夫是超阶级的，超出生产组织各阶级以外，自有特殊的利益”。<sup>⑥</sup>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分及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sup>⑦</sup>，或者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文章后来集结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这本书影响较大，多次再版。

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近代农村问题又是中国问题的主要方面。中国农村性质论战的焦点，集中在对农村经济的分析。属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汪精卫以《前进》为阵地，兜售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念。顾孟余认为，“无论由政治上看还是由经济上看，中国现在绝没有封建阶级。”<sup>⑧</sup>“中国没有农奴，中国的农民没有守田的义务，没有强迫的力役，所以中国没有封建制度。”<sup>⑨</sup>中国也没有什么大地主，尽管有一些“农户”有数千亩土地，但人口多，平均下来，“每人也不过十余亩”。中国没有土地可分，不需要搞什么土地

① 《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②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2页。

③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159页。

④ 转引自林衢主编：《世纪抉择：中国命运大论战》，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9页。

⑤ 陶希圣：《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新生命》1930年第3卷第2号。

⑥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49页。

⑦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161页。

⑧ 顾孟余：《国民党必须有阶级基础吗？》，《前进》1929年第1卷第3号。

⑨ 范子遂：《我所知道的顾孟余》，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0卷（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0页。

革命，更无所谓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因为中国是“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社会”。<sup>①</sup>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为靠山、以欧美自由主义为标榜的代表学者胡适，虽然否定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同样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封建问题，而是“五鬼闹中华”，需要解决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鬼”问题，“封建势力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五鬼不入之国”。<sup>②</sup>

列宁最早提出中国是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国家，但没有把两个词结合起来。列宁去世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对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看法产生分歧。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已然进入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斯大林和布哈林则认为封建残余还占据主流。托洛茨基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商业资本在国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更加商业资本主义化了；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时期”，“中国并无革命局势”，<sup>③</sup>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即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只能等待条件逐渐成熟，才好“把社会主义革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sup>④</sup>

斯大林则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在早期，他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同时也积极与国民党合作。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既然很多省份里农民收入的70%归地主豪绅所有，既然武装和非武装的地主不仅握有经济权力，而且握有行政和司法权力，既然直到现在一些省份里还有中世纪的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情，那就不能不承认封建残余是中国各省压迫的基本形式。”“正因为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压迫的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反对封建残余，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的和军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条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sup>⑤</sup>

托洛茨基不主张国共合作，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反目为仇，让托洛茨基的主张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当时很多人都认为，随着国民党政府的上台，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革命需要按下暂停键，待无产阶级发展壮大后再进行。陈独秀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他的思想也被称为“二次革命论”。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对此说得十分明白：“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

① 顾孟余：《国民党必须有阶级基础吗？》。

② 胡适：《我们走哪条路？》，载邵建选编：《民国名刊丛书〈新月〉时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

③ 转引自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第8册，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

④ 转引自周子东、杨雪芳、季甄馥等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⑤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220页。

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sup>①</sup>陈独秀的这些看法实际上与国民党的某些看法类似，给党的革命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

为了消除陈独秀的负面影响，李立三在1930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分别从“帝国主义怎样统治中国”“封建势力与封建制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三个方面，引用大量材料，系统地批驳了陈独秀所谓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封建势力受到了最后的打击，变成了残余的残余，中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等谬论，论证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他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特别是坚持土地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sup>②</sup>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开始通过《新思潮》月刊系统地反对托派观点和国民政府御用文人的观点。1930年第4期的《新思潮》发表文章《新思潮社第一次征文题目并缘起》，提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的问题。1930年第5期更是刊载了系列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如潘东周（潘文郁）的《中国经济的性质》、吴亮平（吴亮平）的《中国土地问题》、向省吾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和《中国的商业资本》、王学文（王昂）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以及李一氓的《中国劳动问题》。<sup>③</sup>

朱镜我、王学文、潘东周、吴亮平、李一氓、向省吾等人都是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共产党人。他们不仅是战斗在文化理论战线的革命家，而且是很高造诣的学者，其中多数人还担任共产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潘东周、吴亮平、李一氓、向省吾等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王学文、朱镜我是1927年、1928年大革命失败初期入党的党员。“新思潮派”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特殊战斗团体。

1930年7月，“托陈取消派”创办《动力》杂志，严灵峰和任曙作为主要撰稿者发表系列文章，阐述中国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是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除了任曙、严灵峰外，参加论战的还有李季、王宜昌、刘仁静等。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反驳李立三和《新思潮》上发表的文章，宣扬托洛茨基的观点。

严灵峰认为，“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商品输入野蛮民族的国家，将封建的城壁打破，并征服了封建势力”。被征服的封建势力，不仅包括“旧时独立和闭塞的经济制度”，还包括“这种经济制度基础上的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即“旧时的社会制度”。<sup>④</sup>“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虽是复杂，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是居领导（亦即支配）的地位；整个社会的再生产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1页。

② 立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布尔塞维克》1930年第3卷第2—3期。

③ 潘东周：《中国经济的性质》，《新思潮》1930年第5期；吴亮平：《中国土地问题（附表）》，《新思潮》1930年第5期；向省吾：《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附表）》，《新思潮》1930年第5期；向省吾：《中国的商业资本》，《新思潮》1930年第5期；李一氓：《中国劳动问题》，《新思潮》1930年第5期；王昂：《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载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133页。

④ 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载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第141页。

行程要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经济部门之再生产行程的。中国社会内部主要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他们或多或少的要依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势力为其后盾，换言之，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sup>①</sup>

任曙认为，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原动力，“便是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由此才有新的都市以及外与世界市场内与穷乡僻野相联系的新式商业、新式农业、新式工业，以及金融经济”。<sup>②</sup>由此他做出判断，“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sup>③</sup>

中国共产党人则依托《布尔塞维克》《读者杂志》《读者》等刊物进行回应和辩论。1931年5月，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2期和第3期分别刊发了伯虎《中国经济的性质》、沈泽民《第三期的中国经济》和张闻天《是取消派取消中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取消取消派？》等文章。<sup>④</sup>

“动力派”和“新思潮派”对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认识不同。在“动力派”看来，封建制度等同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输入大量商品，使中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即资本主义大发展。“中国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sup>⑤</sup>“新思潮派”指出，帝国主义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变成它的原料出产地，它的商品市场，它的投资的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sup>⑥</sup>资本主义不等同于商品经济，封建社会中也可以有商品经济。

对于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动力派”的严灵峰认为，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绝大部分土地已经落入商业资本家手里，所以剥削农民的是资本家，剥削关系也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新思潮派”指出，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实际上并不由地主利用新式的机器、雇佣劳动者来耕种，“而是把它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sup>⑦</sup>“这不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化’，而是资本家的封建地主化。”<sup>⑧</sup>“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sup>⑨</sup>这种剥削关系，是建筑在土地关系之上的。土地问

① 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上海：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第8—9页。

②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载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89页。

③ 转引自高军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435页。

④ 伯虎：《中国经济的性质》，《布尔塞维克》1931年第4卷第2期；泽民：《第三期的中国经济》，《布尔塞维克》1931年第4卷第2期；张闻天：《是取消派取消中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取消取消派？——评〈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布尔塞维克》1931年第4卷第3期。

⑤ 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载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第160页。

⑥ 转引自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1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⑦ 张闻天：《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载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257页。

⑧ 张闻天：《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载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第258页。

⑨ 吴黎平：《中国土地问题》，载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第359页。

题一日不得解决，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的解放，就一日没有希望。

尽管“新思潮派”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保障中国革命的成功作出了贡献。但他们的文章多是从理论到理论，缺乏系统的、扎实的微观数据资料作支撑。正如薛暮桥所言：“当时的论战主要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还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资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因而，论证中国社会性质仍留下许多空白和不足。”<sup>①</sup>一个好的理论建构必须与社会事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 三、理论建构需要实证：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缘起与展开

可靠的理论建构需要扎实的实证，扎实的实证可以有效佐证理论。马克思通过历史和逻辑的视角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及社会变迁的趋势，即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要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这一研究主要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对于东方，特别是古代亚洲社会，马克思提出了亚细亚社会形态（也称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这个概念首见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在序言里，马克思提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sup>②</sup>“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sup>③</sup>这里的东方社会指的就是亚细亚社会。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建立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上；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互相争斗的情势下，共产主义革命可能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国家发生。列宁从理论和革命实践两方面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提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sup>④</sup>这些理论都为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很多人也是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来探讨的。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共产国际内部曾有不同看法。魏特夫作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自诩对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作过深入研究。20世纪20年代，他从“水利社会”的角度出发，指出“在东方世界中，由于环境干旱和需要对水进行控制，建成了大规模的由国家控制的公共工程，这使得东方的农业、政府和社会有其独特性，使得亚细亚社会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sup>⑤</sup>由此也开启了对东方专制主义的认知。马季亚尔认为，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亚细亚方式的“水利社会”。20世纪初西方资

① 周子东、杨雪芳、季甄馥等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6页。

④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7页。

⑤ 林甘泉：《怎样看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1928年，莫斯科出版了马季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这本书对论战有很大影响。瓦尔加曾提出中国前资本主义没有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只有官僚和劳动者之分的看法。马季亚尔和瓦尔加可以说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代表人物。<sup>①</sup>

马季亚尔1926年到过中国。1927年陈翰笙到苏联时，他正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担任东方部部长。陈翰笙与马季亚尔在同一个研究所工作，经常见面。但一谈到中国农村、中国革命，观点就迥然不同，发生过几次激烈争论。陈翰笙发现，“同我在一起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人都很喜欢辩论，都喜欢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不以具体事实为依据”。<sup>②</sup>马季亚尔会引用一些数据，但陈翰笙对马季亚尔使用的中国农村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也表示怀疑。不过，这些争论使得陈翰笙认识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具体情况，加紧开展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是极为必要与迫切的。一个革命者如果不了解自己的国家，那么可能就无法决定革命的正确方针路线。陈翰笙重视农村调查，还与早期同蔡和森等革命者的接触有关。1926年，蔡和森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时路过北京，约请陈翰笙见面。蔡和森对陈翰笙详细谈论了彭湃领导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那次交谈对陈翰笙尔后开展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很有影响。<sup>③</sup>

1928年，蔡元培领导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成立，设有四个研究机构，其中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所。蔡元培很欣赏陈翰笙的才华，邀请他回国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由于经费有限，社会科学研究所初定以农村经济为研究重点。在蔡元培看来，经济为社会演进的关键，中国农村又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如陈翰笙所言：“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sup>④</sup>农村诸问题的中心“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他的农业生产的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sup>⑤</sup>

陈翰笙从硕士到博士，实际上以史学研究见长。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时，他主要讲授欧洲史和史学理论等课程。通过与李大钊等人的接触，他对社会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陈翰笙与北京俄文专修馆讲师彼得·格林涅维奇来往最密，两人共同研究《资本论》。<sup>⑥</sup>格林涅维奇还介绍陈翰笙认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坎托洛维奇，从后者那里，陈翰笙接触到许多苏联和共产国际出版的书籍杂志，提升了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加强了对国际局势的了解。这一切都让其理论素养得到提高，客观上兼具了学者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他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应该以求得民族自

① 参见[匈牙利]马季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

② 陈洪进：《陈翰笙传略》，《晋阳学刊》1987年第5期。

③ 陈洪进：《陈翰笙传略》。

④ 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国立劳动大学劳动季刊》1931年创刊号。

⑤ 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

⑥ 陈洪进：《陈翰笙传略》。



由独立为核心。有了中心之后，出发点就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已。对于中国农村经济来说，出发点是中国的土地制度问题，其他如人口过剩、粮食恐慌、工资地价等问题都不是出发点。租、税、物价、利息、工资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项目。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应从这五个方面进行观察。这五个方面决定了社会经济结构特征。其中，工资的研究最为重要。<sup>①</sup>

然而，中国各地农村社会进化的程度并不一致，“农村经济之调查势必分区进行，方为合理。”<sup>②</sup>于是，陈翰笙计划调查江南、华北和岭南三个地方的农村，因为这些地方工业化程度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都相对较高，对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来说非常具有代表性。正如陈翰笙所言：“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工业资本的侵入，尤其是最近金融资本的侵入，已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其最大的影响即工业化和农产品的商品化，已渐次深入农村。这种社会的和经济的进化程序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上，逐渐的，也是必然的，要动摇旧社会的基础。因此，社会学组主张在江苏、河北、广东，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三省中，开始从事实地调查。”<sup>③</sup>当然，由于一些原因，岭南的调查在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时并没有完成。

江苏的调查地点选在了无锡。无锡是陈翰笙的老家，他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便于调查工作的开展。无锡是中国民族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了解了无锡农村，就能了解帝国主义以及买办阶级是如何影响中国农村的。根据廖凯声回忆，选择无锡作为调查对象有以下考虑：首先，无锡是纯粹的中国工商业资本最发达的一个地方，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固然比它还发达，但只是一些外国资本的市场；其次，无锡耕地零碎，田权复杂，“无锡每户每家耕田普通只有三亩至五亩，并且常常分散在四五处地方，每处田亩只有几分大小。这样零碎的耕地又往往为两家或三家所属有。在无锡的农民要得到充分的土地来耕种差不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第三，无锡的乡村金融剥削严重，“借贷、押当、起会、放账等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在无锡农村中具有雄厚的势力，十分之八九的农户差不多都负有债务。近年来因为战事和农村骚动的影响，乡村资本愈益趋向城市，农户借贷，更加困难。”<sup>④</sup>

河北的调查地点选在保定（清苑），因为“以清苑之农村经济、颇足代表河北平原区域之一般状况、亦可称华北农业兴盛地方之代表区”。<sup>⑤</sup>具体的调查方法是从每省之内，又选定一个农业最繁盛、工商业最发达的县为调查地点。在这一县内用初步的经济调查决定几个区域。在各区域内，又选定一定比例数的农村以为代表。在这样的代表农村中，对每一村户都进行仔细、完全的挨户调查；此外，再选定村与邻村的中心市场，“亦加以概况调查，藉资参考”。<sup>⑥</sup>无锡和保定的农村调查在陈翰笙离开中央研究院前完成了，岭南调查则是在中山文化教育基金会的

① 陈翰笙先生讲、汝雄善纪要：《中国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教育新路》1934年第59期。

② 陈翰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国立劳动大学劳动季刊》1931年创刊号。

③ 《陈翰笙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④ 廖凯声：《无锡农村调查记略》，载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页。

⑤ 《农村经济调查团到保定分期调查各农户干事陈翰笙谈该团任务》，《大公报（天津）》1930年6月5日第5版。

⑥ 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

资助下完成的。为了开展调查，陈翰笙大力聘请年轻人，如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等人。<sup>①</sup>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大都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其中，王寅生是陈翰笙在北大教书时的学生，他是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实际执行者。同时，王寅生和薛暮桥也参加了岭南的调查。<sup>②</sup>

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计划由陈翰笙、王寅生和王立我三人制定，以“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的名义进行。王立我参与过金陵大学卜凯组织的调查，有一定的经验。无锡的调查是从1929年7月初开始，至9月底结束，历时近3个月。<sup>③</sup>无锡挨户调查共计调查了22个村，挨户调查结束后又通信调查了55个自然村的概况和8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保定（清苑）的调查自1930年5月开始，8月份结束。<sup>④</sup>保定调查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完成的，仍由陈翰笙主持，主要组织者仍为王寅生等人。<sup>⑤</sup>保定（清苑）共计调查了11个村，逐户调查共计1770个农户。除此之外，还对72个村庄和6个农村市场做了概况考察。

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时，傅斯年就质疑过陈翰笙的左派身份，但陈翰笙一直受到蔡元培和杨杏佛的保护，工作还可以正常开展。后来杨杏佛遇刺，傅斯年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给陈翰笙的工作带来很多干扰。1933年，南京政府下令将中央研究院由上海迁往南京，陈翰笙不愿失去研究的独立性，拒绝搬迁。与蔡元培商议后，陈翰笙辞去了中央研究院的工作。<sup>⑥</sup>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后期整理和研究工作实际上并没有全部完成。

#### 四、调查支撑了理论建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调查的后期工作虽有遗憾，但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他们也撰写了一些论文和报告。这些论文说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如《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等。《亩的差异》开创性地发现无锡所谓的亩至少有173种，同一个村亩的差异至少有5种。报告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没有发展的中国本不能有统一的度量衡，并且积受了数千年分家、租佃、典押、买卖等习俗的影响，到现在差不多每一农户所谓亩也就都有两三种的大小。”这“使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更加厉害，同时使地主更可浮收田租”。<sup>⑦</sup>这些成果说明中国至少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性质。

陈翰笙、王寅生和钱俊瑞撰写了《无锡的土地分配与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无锡调查报

① 孙小礼：《陈翰笙与中国农村研究》，《民主与科学》2012年第3期。

② 孔繁坚：《解放前老社会工作者的农村调查》，《社会》1984年第3期。

③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29年，第307页。

④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第307页。

⑤ 北平社会调查所隶属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陶孟和为所长，经费相对充足，在调查界声誉日隆，1934年并入社会科学研究所。

⑥ [美]麦金农：《陈翰笙与太平洋国际学会》，载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23页。

⑦ 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告)》，但这份报告被国民党当局搁置，一直没有发表，后来不幸丢失。保定的调查报告则没来得及撰写。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陈翰笙和邱茉莉 (Elsie Fairfax Cholmeley) 还编写过一本《农村中国》，其中第二章“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Land Concentration in Wusih, Near Shanghai”)和第六章“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Change in Land Ownership and The Fate of Permanent Tenancy”)反映的是两种未刊报告《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土地所有权的近代化》的思想。在《土地所有权的近代化》中，陈翰笙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之前，土地不是个人私有财产，而是由整个家庭或家族所有 (Owned by The Entire Family or The Clan)。这类所有权一般来说并不完整，其移转受到形形色色的限制。只是在资本主义形式的财产所有权形式 (A Capitalistic Form of Property Ownership) 占主导地位时，个人所有者才拥有根据意志使用或破坏的权利。”而“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类型 (The Capitalistic Type) 的个人所有土地财产在数量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sup>①</sup>这也证明了中国社会的前资本主义形式，或者说封建性。

无锡、保定两地农村调查的数据分析，以土地产权结构和人群社会结构分析为核心，主要有两个结论：一是土地集中的趋势，二是农田分散的趋势。

土地集中的趋势。无锡、保定两处农村调查的统计结果，目的在于“实欲测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发展之高度，且欲观其发展之形式”。整理的步骤，“先折合各调查表中各种度量衡之单位；次则确定各户之田权关系，及计算各户之农田投资与收获；再次，根据各户之田权关系及当地农田之单纯再生产费，确定各户为纯粹地主、经营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或雇农”。<sup>②</sup>根据对16个村的初步统计结果，农户和其他村户占整个户数的96.58%，地主仅占户数总数的3.42% (见表1)。按照陈翰笙在《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附表)》对第一次无锡调查的20个村庄中1035户农家土地数据统计，无锡的地主仅有5%是经营地主，户数不及总数的6%，占有耕地47%，其余69%的人家都是贫农与雇农，占有田地仅为百分之14.2% (见表2)。<sup>③</sup>保定的贫农与雇农平均每户不到7亩地，65.2%的贫苦农户只有耕地的25.9%，11.7%的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的41.3%。保定60%以上的地主，人口占村民2.36%，“虽然自家管理产业，但不从事耕种。有3%的地主，占地10.57%，雇佣贫农与雇农代他们耕作。”<sup>④</sup> (见表3)这些统计，正如范苑声在《我对于中国土地问题之认识与意见》中所说，构成农村土地关系所发生的两种严重倾向，即“土地集中”和“农业人口之阶级的分裂”。造成这两种严重倾向的原因，一是政治紊乱与土地投资，二是地主对佃户采取超额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sup>⑤</sup>

① Research Staff of the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grarian China: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 from Chinese Author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9, p.21.

②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30年，第358页。

③ 陈翰笙、黄汝骧：《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附表)》，《中国经济 (南京)》1933年第1卷第4、5期合刊。

④ 陈翰笙、黄汝骧：《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附表)》。

⑤ 范苑声：《我对于中国土地问题之认识与意见》，《地政月刊》1933年第1卷第9期。

表1 无锡农村中各类村户之百分比（16村963户之统计）

地主 3.42%		农户 76.54%				其他村户 20.04%
纯粹地主 33.33%	经营地主 66.67%	富农 10.45%	中农 17.64%	贫农 70.55%	雇农 1.36%	—

资料来源：《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第358页。

表2 无锡土地分配情形（1929年调查）

	农家数目（户）	农家百分比	占有地亩（亩）	地亩百分比	每家平均地亩（亩）
地主	59	5.7%	3217	47.3%	54.5
富农	58	5.6%	1206	17.7%	20.8
中农	205	19.8%	1418	20.8%	6.9
贫农与雇农	713	68.9%	965	14.2%	1.4
总计	1035	100%	6806	100%	6.6

资料来源：陈翰笙、黄汝骧：《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附表）》，《中国经济（南京）》1933年第1卷第4、5期合刊。

表3 保定的土地分配情形：10村中之地主与农民（1930年）

	农家数目（户）	农家百分比	占有地亩（亩）	地亩百分比	每家平均地亩（亩）
地主	58	3.7%	3392	13.4%	58.5
富农	125	8%	7042	27.9%	56.3
中农	362	23.1%	8400	32.8%	23.2
贫农与雇农	1020	65.2%	6686	25.9%	6.6
总计	1565	100%	25520	100%	16.3

资料来源：陈翰笙、黄汝骧：《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附表）》，《中国经济（南京）》1933年第1卷第4、5期合刊。

农田分散的趋势。农户耕地地段大小可以反映社会和经济的双重意义。第一次保定调查的结果显示，1390户农家中4.84%的地块每段不到1亩，57.09%的地段每段有1亩到4.99亩，38.07%的地段每段有5亩及以上。地主、富农的耕地地段大块占比最高，小块占比最低；反之，雇农小块地段占比最高，大块占比最低。1929—1930年间的土地变动过程中，许多贫苦农户通过售卖、押当、分产等方式，丧失了自身较大地块，余下较小地块，所以大块地段日益减小，小块地段日益增多。同时，每段耕地的平均面积的一般趋势也在减少，甚至在地主和富农地段上也有体现，在贫农、雇农之间，这种趋势尤为显著。农田分散的趋势虽与农田面积无关，却是农业生产的障碍，因为分散的农田使合理化管理农场和土壤改良工作无从实现，间接导致了土壤肥力的日益枯竭、农业生产下降。<sup>①</sup>

<sup>①</sup> 陈翰笙、黄汝骧：《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附表）》。

表4 1929、1930年保定1390户农家土地地段面积变动趋势

	1929年	1930年		1929年	1930年
管业地主地段平均面积	10.63 亩	10.47 亩	贫农地段平均面积	3.32 亩	3.31 亩
指数	100	98.5	指数	100	99.7
富农地段平均面积	8.1 亩	7.99 亩	雇农地段平均面积	1.88 亩	1.8 亩
指数	100	98.6	指数	100	95.7
中农地段平均面积	4.66 亩	4.61 亩	平均地段面积	5.72	5.64
指数	100	98.9	指数	100	98.6

资料来源：陈翰笙、黄汝骥：《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附表）》，《中国经济（南京）》1933年第1卷第4、5期合刊。

在《无锡的土地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前途》中，陈翰笙认为：“目前中国农村总的局势（the general agrarian situation）当然不能说在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但另一方面现有的土地集中和租佃制度仍然嵌含（be embedded）在封建主义残余（feudalistic remnants）之中。”<sup>①</sup> 保定的调查报告没有完成，但“华北的自耕农，和中华南的佃农，是一样的贫穷，一样的受压迫”，“北方自耕农和南方的佃户，在经济上既是同处低落的地位，他们对于革命的要求是没有分别的。”<sup>②</sup> 通过陈翰笙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到保定农村调查带给他们的初步认识。陈翰笙一直强调，不能因为个别地区土地矛盾的特殊性来否认中国土地占有矛盾的普遍性，不能因为农民有自耕农、佃农的不同区分，就否认农民迫切的革命要求。陈翰笙认为，土地所有权集中，使用权分散，农村中间资本主义不能发展，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特质。“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因受封建残余的剥削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各地封建势力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据，另一方面其所以在今日还能存在及延长者，即因受帝国主义保护之故。”<sup>③</sup> 因此，陈翰笙指出：“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纯粹的封建已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田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三种合并起来，以农民为剥削的共通的目标。”<sup>④</sup> “在半封建制度的情形下，就大大不同了。一方面忍受封建的余毒，另一方面又逃不了资本主义之剥削。这一种双重的压迫已经够受了。又加上中国沦于半殖民地的地位。”<sup>⑤</sup>

薛暮桥后来说：“我们做了很多农村调查，我们收集的资料完全证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sup>⑥</sup> 薛暮桥参加过对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的整理，后来在广西师范专科学校

① Research Staff of the Secretariat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grarian China: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 From Chinese Authors”, p.9.

② 《陈翰笙文集》，第128页。

③ 陈翰笙先生讲、汝雄善记要：《中国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

④ 陈翰笙：《中国田地问题》，《农业周报》1930年第53—55期。

⑤ 《陈翰笙文集》，第127—128页。

⑥ 周子东、杨雪芳、季甄馥等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121页。

教书，讲授中国农村经济时，也用了以前调查的资料。同时，他还在广西带领同学进行调查。通过这些资料，他认为可以“说明中国的土地关系、租佃制度都是封建性质的，同时又受到帝国主义的剥削”。<sup>①</sup>

总之，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比较系统的一次微观调查。从覆盖的区域看，他们将调查对象聚焦于南北两地的33个村，具有较好的典型意义。调查层级覆盖到村和农户两级，也让调查资料非常扎实，有助于进行科学分析。曾有学者针对1929—1930年“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几次向陈翰笙请教，陈翰笙都强调了这次调查的学术性。他说这些学者信奉马列主义；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接近中国共产党，信仰上与中国共产党相一致；尽管调查带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但他们是严肃的学者；他们不是要制造事实以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是要在实践中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们真心相信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并力求通过认真、扎实的实地调查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因此，在整个调查的设计和进行中，他们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基于此，运用这些资料得出的结论，即中国土地关系是处于封建制度之下的且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构成了阻碍，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一调查及其结论有力地呼应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

何干之在总结这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时说：“现在试任意执住一些肯和实际问题接近的青年，问他们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我想除了极少数头脑已经硬化的不算以外，一定会回答说：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sup>②</sup> 吴亮平后来回忆：“在白区进行的这场论战，是和毛主席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紧密呼应的。”<sup>③</sup>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作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上半期三场论战的核心，无锡、保定等地的农村调查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和证据。

胡绳对陈翰笙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评价：“（20世纪）30年代初还是中国革命的苦难时期，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冲突达到非常激烈程度，与这种政治形势相联系的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也就是关于革命性质的大论战，为了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陈翰笙同志集中精力研究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特别着重研究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sup>④</sup> 而且，恰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所言：“陈翰笙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1933年，他和薛暮桥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sup>⑤</sup>

① 周子东、杨雪芳、季甄馥等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121页。

② 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③ 周子东、杨雪芳、季甄馥等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117页。

④ 转引自田森：《三个世纪的陈翰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

⑤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页。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建构的一部分，有力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现代化理论的进展。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作为一次持续时间较长、涉及区域较多、调查问题较广、调查方法较规范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为中国农村调查奠定了基础。作为当时众多调查中的一个，它“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激荡人心的转型过程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国人的认知观念对社会剧变的一种反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此前已然发生的种种现代化努力的一种深刻的反思……是当时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国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者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sup>①</sup> 他的调查和分析，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更多是基于理论逻辑；在他们之后，马克思主义分析则呈现了理论和经验证据相结合的形态。这种分析范式不仅成就了中国的革命理论，而且有利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建构。亚细亚概念本身强调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举，而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则为论述这一独特性和理论创举提供了微观实证基础。

这一调查和论战，还让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话语主导权从苏联转移到了中国本土。在这次调查之前，国际上研究中国农村的主导力量在苏联和日本，此后人们意识到，陈翰笙等人是真正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人。1935年纽约《太平洋事务》季刊发表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的长篇论文，称陈翰笙为“中国最有能力的农村经济研究者”。麦金农认为：“陈翰笙的农村调查工作旋即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田野调查的前驱，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何廉和方显廷，及南京的卜凯相匹敌。”<sup>②</sup> “陈翰笙所做的保定和无锡调查的系统性及其分析中所采用的比较研究的方法给卡德和霍兰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应他们的邀请，1933年10月，学会在加拿大班夫举行会议时，陈翰笙前往班夫，并向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论文，他还就未来的研究计划向学会提出了资助申请。这一届会议，何廉及其南开研究群体头一次未出席。事实上，从此时起，他们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研究项目中所占优势地位告一段落。换言之，陈翰笙在班夫会议上的个人影响是意味深长的，象征了中国分会在导向上的重大变化。”<sup>③</sup> 有学者还将美国汉学家柯文（Paul A. Cohen）提出的“中国中心”模式追溯至20世纪上半期任职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陈翰笙等人，认为他们“自觉地从中国内部视角或以社会实情为基点来研究中国历史”，其内在理路与“中国中心”模式是一脉相承的。<sup>④</sup>

这次调查还为我国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陈翰笙以中央

① 夏明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兴起》，《中华读书报》2007年8月1日第11版。

② [美] 麦金农：《陈翰笙与太平洋国际学会》，载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下），第423页。

③ [美] 麦金农：《陈翰笙与太平洋国际学会》，载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下），第423页。

④ 熊月之：《西风东渐与近代社会》，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509—511页。

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为据点，组成了一支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坚持革命立场、能努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不怕艰苦的研究队伍（如王寅生、石凯福、张稼夫、张锡昌、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秦柳方等三四十位革命青年），解放后，其中不少人成为富有经验的专家。薛暮桥晚年曾经表示：“陈翰笙的《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等著作，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教材，把我引上了研究这一门科学的正确道路。”<sup>①</sup>在这次调查中，这些人锻炼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让他们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陈霄元）

## The Debate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Rural Areas in Wuxi and Baoding

Sui Fumin Sun Ji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issues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30s, there was a debate in the Chinese theoretical community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including discussions on three issues: the debate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the debate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ebate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As a scholar with global influence in modern times, Chen Hansheng, starting from China's reality and taking the most urgent rural issues in China at that time as a starting point, conducted rural economic surveys in Wuxi and Baoding, collected a large amount of micro evidence, and solidly demonstrated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China's economy, which has long been a concern of the theoretical community since modern times.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modern Chinese society was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with scattered rural land rights and heavy tax burdens. Financial exploitation of farmers such as land rent and rural usury was a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ality of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The investigation in Wuxi and Baoding provided realistic support for the revolutionary theory of the CPC and objectively promoted the spread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thought.

**Key Words:** Debate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Rural Investigation in Wuxi, Baoding; Chen Hansheng

---

<sup>①</sup> 陈洪进：《陈翰笙传略》。